

华北国医学院的创办对燕京医学学院派的影响评议

刘昕怡 周盈 张健真 邓宇 张富璋 李元文 蔡玲玲

【摘要】 民国初年,华北国医学院的创办推动了燕京医学学院派的发展。同时随着时代变迁,其在培养学生临床技能和吸收西方医学先进理论方面的弊端在当代中医药院校教育中也得以显露。本文从华北国医学院对燕京医学学院派发展所做的贡献和负面影响做了综合论述,同时提出了建立大样本中医跟师机制、成立中医特色教学诊室、改良中西医课程设置等近现代中医药学院教育新思路。

【关键词】 华北国医学院; 燕京医学学院派; 中医药近现代教育评议

【中图分类号】 R2-09 **【文献标识码】** A doi:10.3969/j.issn.1674-1749.2016.08.017

华北国医学院,培养了大批中医药人才,为现代中医药高等院校教育模式的形成提供了借鉴,从而推动燕京医学学院派的发展。但随着时代变迁,社会对中医药人才的要求有所改变,现代中医院校教育继承下来的教育模式趋于固化,缺乏革新,显露出不可忽视的局限性。现代中医院校教育牵动着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宏图,其传承与创新值得深思。

1 华北国医学院的创办

20世纪初,传统中医药事业日渐衰微。从1820年英国传教士在澳门开设第一家西医诊所起,西方医学凭借较完备的理论体系和精致优良的医疗器械,得到当时政府及人民的普遍认可,迅速在中国各地发展兴盛。同时,中医医道废弛,从业者资质水平参差不齐,民众多倚赖四处游走的江湖郎中和赤脚医生医治,庸医误人的事件时有发生。于是部分西医常借此否定打压中医,加上当时执政者对中医颇为排斥,既没有设置任何管理中医的机构,也没有建立任何公立的中医学府和研究机构。1929年余岩提出《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

卫生之障碍案》,虽赖全国中医药界奋起反对而得以作罢,但传统中医药已危在旦夕。

施今墨曾言:“吾人环境,非振兴医术,绝不足以自存,故感断言中医之生命不在外人,不在官府,而在学术也。”^[1]在这种背景下,通过办学复兴中医已迫在眉睫。当时中医教育形式主要分为两种:师承形式和宫廷医学教育形式。清政权被推翻后,中医教育便以师承为主,包括家传、师承、私塾等方式,这种教育方式具有因材施教、紧密联系实践的优点,但这种模式下老师学术思想的局限性、中医传承中的“门户之见”、传统文化中对师长的盲目尊崇等弊端都制约着中医药教育的进步和发展。突破传统中医药教育模式,创立与西方现代教育相符的专门学院理应提上日程。

施老曾说:“复兴中医有三大重点,即编书、办医院、开学校三位一体之事是也。盖编书为保存过去经验,办医院为应用现代经验,开学校为推广未来经验。”^[2]在中医存亡之时,本着“救中医救中国”的宏愿,为了中医药未来的传承发展,施老毅然肩负起挽救中医药的重任,创立华北国医学院,为近代中国培养了大批优秀的中医药人才,开创了中医药教育发展的崭新时代。

2 燕京流派的形成与壮大

燕京流派是燕山和北京地区的医学流派,分为宫廷派、师承派和学院派。其中宫廷派汇集了全国各地名医,主要服务于封建王朝的达官显贵,虽不乏以韩一斋、翟文楼、赵文魁等为代表的名医,但总体因患者群的单一、用药的制约、清王朝的覆灭等因素走向衰落。师承派更注重学生的个体化的

作者单位:100078 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刘昕怡(本科生)、周盈(本科生)、张健真(本科生)、邓宇(本科生)、张富璋(本科生)、李元文、蔡玲玲]

作者简介:刘昕怡(1994-),女,2012级在读本科生。研究方向:中医学。E-mail:colleen0621@163.com

通讯作者:李元文(1962-),本科,博士生导师,北京中医药学会皮肤科分会主任委员,中国性学会理事,中华中医药学会皮肤科分会副主任委员等。研究方向:中医皮肤病。E-mail:yuan-wen@sohu.com

学习,广泛接触临床,加快学习进度,但由于师承派中老师个人经验水平良莠不齐、授课带徒精力有限以及传统中华文化师道至上思想都制约着中医药教育的发展壮大。

在这种背景下,学院派应运而生,其较前两者有了更规范、科学的管理制度和教学模式,在教学质量上有了更严格的把控和保证。学院派以民国时期“京城四大名医”为首的一批燕京优秀中医为代表,共同创建北平国医学院和华北国医学院用以传道授业解惑。同时培养出包括翟济生、哈荔田在内的一批优秀人才,为燕京流派的传承提供了新鲜血液。

3 华北国医学院为学院派的形成壮大提供了借鉴

在北平国医学院仅创办几年即停办后,华北国医学院独自扛起了燕京流派中学院派传承发展的大旗,对学院派在办学理念、教学内容、教材编写、人才输出、知识普及等诸多方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3.1 办学理念

华北国医学院的办院方针为:“以科学方法整理中医,培植专门人才,决不拘泥成法,固步自封,唯一宗旨,希望阐明先哲之遗言,借助新医之实验,为人群造福。”^[4]由此可见,其办学理念注重中西医结合。在临床治疗方面,不仅重视中医理论指导辨证分析与诊疗思路,还结合了西医诊断方法,体现了中医为主、中西兼授、融会贯通的教学方针。

《华北国医学院第二届毕业纪念刊》提出“医戒十二条”,强调医者治病应仁心仁术,以病患为先,无论贫贱富贵一视同仁;医者自身应淡漠名利,友爱同道,勿醉心酒色名利,虚伪奸诈,嫉妒同行,相互倾轧。同时设置体育、国术等相关课程,提倡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办学理念;还设有医史、医案等课程,反映了学院在教学过程中吸收各派学术精华,没有门户限制,为学生提供了更广阔的选择空间。

此外,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华北国医学院的另一特色办学理念。在日常课程中,除了理论课程,还开设了临床实践课程,有利于学生将学习到的理论知识运用到临床实践中,聘请了一批有真才实学、热心中医教育事业、在临床治疗方面有所建树的名贤首宿任教,这一理念至今仍被北京中医药大学等中医高等院校所沿用。

总体来看,华北国医学院的课程设置体现了课程体系的整体化原则、课程内容全面性和重点性结合的原则、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知识积累与能力培养相结合的原则等特点,促进了燕京医学之学院派办学理念的规范化。

3.2 教学内容

在教学内容方面,华北国医学院坚持:(1)课程体系的整体化原则,华北国医学院设有伤寒、金匱、温病、针灸、脉学、医案、实习诊治、外文(日文、德文)、体育、解剖、生理、生药、法医以及西医诊断和內、外、妇、儿、五官、花柳科等 37 门课程,课程体系十分完备,现代高等中医教育开设的学科基本与之相同;(2)内容全面性和重点性结合的原则,建设较为完善的课程体系,既包括中医经典和中医各科,也包括西医基础课程和西医各科,但还是以学习中医类课程为重点;

(3)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华北国医学院在建成一年后,即创立附属诊室一间——“诊务甚为发达,学生借以实习”,并且由施今墨亲自应诊,现场为学生讲解,使学生直接接触、诊治患者,提高医疗水平;(4)知识积累与能力培养相结合的原则。这些特点说明学院派在教学内容上与近现代高等教育模式相衔接,凸显出其较师承派、宫廷派更有优势。

3.3 教材编写

在华北国医学院刚刚创建的时候,由于社会和政府对中医的压制态度,加上古代中医师承主要采用现成的经典古籍作为教材,导致中医院校缺少系统、完整的教材。华北国医学院的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依靠自身经验和历代各家心得体会编写了一系列的教材,例如教授朱壶山在《伤寒杂病精义折中》中曾提到编写过程:“取伤寒杂病论潜心研释,采历代各家之注解,取其驳杂取其精切,附以个人实验所得,时阅十年稿,凡五易书成。”^[5]

在编写教材的过程中,受到西医传播的影响,学院教师们开创了中西医结合编写教材的先例;例如《急性传染病讲义》,虽是西医讲义,但在治疗上讲述了中医疗法,且不存在门户之见,吸收各家学术精华,以发散思路。对西医课程,学院在参考近代西方高等学校的课本的基础上加以改编,形成适合中医专业学习的西医教材,例如《生理学讲义》与现在中医药院校的课本体例基本一致,但在三焦、六经、月经之倒经等方面有一些独到的见解,很好地解释了中西医相关的概念,有利于学生形成中西汇通的辩证诊疗思维。此外,施老还开设了医案学,开创了编写医案的规范。

“这些教材 1961 年《中医图书联合目录》中被收录了 12 本”^[6],给现代中医教材的编写提供了参考,使学院派的教育水平得到了提升。

3.4 人才输出

华北国医学院作为继北平国医学院停办后燕京地区唯一一座高等中医药学府,除院长施今墨外,授课教师也多为当时著名医家,如金匱教授杨叔澄、内科教授朱壶山、妇科教授姚季英、病理法医教授施汝柏等。这些教师同时兼任北平地区其他中医药院校如北平中药讲习所的讲师。

高益民考证,“华北国医学院 1932 年建院到 1950 年,共历时 18 年,招生 20 班,入学人数约为 636 人,毕业人数约为 347 人”^[7]。在当时是民国时期开班时间最长的中医院校,其中许多华北国医学院的优秀毕业生都在以后的中医界有很大的建树,如学生祝谌予后任北京中医学院教务长兼金匱教研室主任;李介鸣参与了北京中医学院的创建,并承担了教学工作;翟济生后创办华北国医学院察哈尔分院,任院长兼教务工作;董德懋后历任华北国医学院副院长;方伯屏、吴兆祥、姚五达、哈荔田、李介鸣、张作舟、李辅仁、马龙伯、丁化民、顾小痴、王为兰等,均成为当代中医医学界之栋梁。

可见,华北国医学院为中医界培养了一大批中医药人才,担负起了北京乃至整个燕京地区中医药人才教育输出的重任,为学院派的传承奠定了人才基础。

3.5 知识普及

在进行教学同时,华北国医学院还创办了各类中医期刊,普及中医文化思想,其中包括施今墨主编的《文医半月刊》和《国医砥柱月刊》、董德懋创办的《中国医药月刊》等,这些期刊涵盖了中医专业知识的交流和通俗易懂的中医经验,为推动中医广泛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

综上所述,华北国医学院以其较为完善的规模,先进的教育理念,推进了学院派的形成与发展,对燕京地区中医药教育事业产生了深远影响,其在解放后与北京地区其他中医药教育机构,改组合并为北京中医学院;1956 年正式更名为北京中医药大学,成为了中国中医药教育的最高学府之一,对燕京医学流派的发展壮大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4 华北国医学院的教育模式局限了学院派在当代的发展

华北国医学院是民国时代各种社会因素影响下的产物,在当时具有其创新性,但由于时代变迁、中医传承自身特点以及现代教育模式的弊端等因素,若不改进创新以适应时代发展,其教育模式的时代局限性在新世纪的学院派发展中暴露无遗。

就办学模式而言,华北国医学院在引进西方现代高等教育模式的同时,也丧失了传统中医师承教育的优势,虽有开设实践教学课程,但与传统宫廷或师承派等在实战中掌握诊疗要领的模式相比还相差甚远,学生真正进入临床需要更长的转换时间。

就教材使用而言,华北国医学院编写了诸多系统性、总结性的中医教材,避免了师承以经典原文作为教材导致的中医知识体系不完善的缺点,却忽视了传统中医经典的学习,学生大多研习教材,忽视了古代中医著作的研究。此外,现代西医教材多采取自编西医教材教授西医课程,这些教材通常用中医解释西医内容以符合中医教育,虽符合中西医结合的原则,有助于中医学生的理解,但使得教材有失严谨,易给学生带来困扰。

就人才培养而言,由于学生一味地从课本中学习中医中药知识,缺少师承教育给学生带来的直观感受,所以培养出的中医药人才存在“医药分离”现象。由于对中药的原始状态和饮片特征等知识的匮乏,临床上不辨药物属性、方药剂量不恰当等问题时有发生,从而影响临床疗效。

5 当代中医药院校教育模式需要在传承的基础上创新

如同华北国医学院在建院之初设立诊室供学生跟诊学习一样,跟师跟诊在中医传承教育中占有不可替代的地位,现代中医教育兼顾学院派系统规范的现代医疗知识体系和师承派真刀真枪的临床实践技能,在本科高年级学生尚未对中医形成自己的独特感悟、有一定分辨判断力之时,建立大样本的跟师轮转机制,加强跟师教育,其目的不仅是使学生

增强临床实践技能,更是摆脱书本的限制,通过临床中观察到的老师们多种多样的诊疗思路和独特的中医见解,开拓中医诊疗思路,为日后建立自己独特诊疗思路奠定基础 and 提供广泛的学习借鉴。

西方医学的先进理论研究是构成现代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传统中医吸收借鉴,应改良中西医课程设置,西医课程就专注于西医内容以求严谨规范;重视中西医理论思维方式的建立顺序,科学安排课程。

对于“医药分离”的情况,院校教育还可以在课堂教学之外增加对于中草药的直观认识。上山采药的实践课程不应该专属于中药专业的学生,而应该让学生普遍地融入到其中,加强对中医药的直观认识。

目前的中医院校经典课程设置延续了华北国医学院的中医经典教育模式,主要通过对中医经典条文逐条解释来学习中医经典。然而这种模式易使经典与临床分离,不能使经典发挥应有作用。另一方面,现代医疗机构普遍采用的医学分科其实并不适用于传统的中医诊疗,如果能根据中医诊疗特色建立相应的“伤寒诊室”“温病诊室”等,让学生在临床病例中学习中医经典、践行中医经典,既增加了学生学习经典的兴趣,又加深了其对于中医经典的理解。

综上,纵观华北国医学院在燕京流派学院教育中的发展历程和影响,其顺应时代发展,为近现代中医院校在办学理念、教学内容、教材编写、人才输出、知识普及等诸多方面提供了良好的借鉴。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对中医药人才的要求也有所改变,现代中医院校教育继承下来的教育模式趋于固化,缺乏革新,显露出了其不可忽视的局限性。现代中医药教育工作者应在传承与创新中间寻找平衡点,以传播中医药知识为目标,开创出符合当今时代的中医药教育教学模式,为中医的传承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参 考 文 献

- [1] 华北国医学院. 华北国医学院第二届毕业纪念刊[M]. 北京: 国家图书馆, 2013.
- [2] 张镜源. 中华中医昆仑[M]. 第一集.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12: 390.
- [3] 黄瑛. 近代中医学校教育体系概述[C]//中华医学会医史学分会. 中华医学会医史学分会第十四届一次学术年会论文集, 2014: 3.
- [4] 李岩. 北京四大名医研究[D]. 北京: 北京中医药大学, 2004: 9-10.
- [5] 朱菲. 伤寒论精义折中[M]. 北平: 华北国医学院, 1936.
- [6] 董泽宏. 民国时期的北平中医药发展史研究(1912-1949)[D]. 北京: 中国中医研究院, 2005: 1-13.
- [7] 张晓明. 高益民老中医临证经验集[M]. 北京: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10: 269.

(收稿日期: 2015-01-03)

(本文编辑: 董历华)